

泉風浪與1920年代臺灣農民運動：

以泉風浪著作為中心

蔡蕙頻*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博士生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助理



* 感謝諸位匿名審查人對本文缺失之處不吝提出指正，並給予許多正確的意見和修改建議，使得本文得以盡量減少錯誤。本文已儘可能參酌審查人意見修訂，再此向曾對本文提出修正建本文使用圖片為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藏，在此一併致謝。

摘要

1920年代是臺灣農民運動風起雲湧的年代。相對於臺籍菁英受到研究者的注意，農民運動中有少數支持臺人立場的日籍菁英參與，卻較少有人探討這些日籍菁英在農民運動中的位置。其中，身為《臺南新報》記者的泉風浪，不僅支持數個關鍵的農民組合，也參與了多場重要的抗爭，本身更留下多本著作。本文從泉風浪的生平及經歷切入，了解其人的性格與活動，以及其政治參與程度，再透過泉風浪的回憶錄及著作，嘗試闡明身為一名日籍菁英，泉風浪如何看待1920年代的臺灣農民運動，最後進一步嘗試分析他在以臺灣農民為主的農民組合與農民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並從其對農組的方向及農民運動的運作模式等看法，了解身為支持臺人立場的在臺日本人，對臺灣農民運動的態度與侷限。

關鍵字：泉風浪、農民運動、在臺日人、記者

一、前言

1920年代是臺灣農民運動風起雲湧的年代。在現有的研究裡，雖然已有不少討論農民組合與農民運動的研究，但令人意外的是專以農民運動為題的研究專書（不含研討會論文集）不多，即使是日治時期臺灣政治社會運動研究時，整體而言，論及農民運動的篇幅也不大，主題亦十分集中。¹淺田喬二於1973年出版之著作《日本帝國主義下の民族革命運動—台灣・朝鮮・『滿州』における抗日農民運動の展開過程—》是農民運動研究的重要著作。淺田喬二將日本統治下的臺灣、朝鮮、滿洲國並置，以民族運動的角度重新檢視各地蜂起的農民運動。其中關於臺灣的部分，他認為總督府的土地調查、林野調查事業透過確定土地所有權排除了實際耕作卻無地權的臺灣農民（所謂的「無斷開墾者」），也為日本資本主義進入臺灣打下基礎工程，再加上官方將土地放領、不當收奪等行為造成爭議，使得臺灣農民運動漸次興起。接著，淺田進而分析臺灣農民運動陣營方面的變化。農民組合出現代表農地爭議逐漸由個人的單打獨鬥走向團體的結合，後來臺共掌握農組後，農民運動開始帶有民族解放的色彩，直到1929年二一二事件發生後，農組遭受打擊，即使同年底農組中央委員試圖重建組織，終因1931年6月與12月官方彈壓臺共成員，農組活動幾乎潰散。²淺田喬二早在1973年即完成對農民運動形成與轉變之分析，可說是完整的早期研究，可惜在該書之後，未見完整的後續研究。

1 既有研究成果中，以農民運動為題的專書內容皆偏介紹性質而非學術研究，如洪長源、魏金絨，《二林蔗農事件：殖民地的怒吼》一書為二林文史工作室執行的地方史撰寫計畫，該書蒐集關於二林蔗農事件之地方史事編成，文章淺顯易懂，可惜是介紹重於論述。在主題方面，重大事件和左傾後的農民組合及其活動較受研究者青睞。

2 淺田喬二，〈第二章 台灣における抗日農民運動の展開過程〉，《日本帝國主義下の民族革命運動—台灣・朝鮮・『滿州』における抗日農民運動の展開過程—》（東京：未來社，1973年9月），頁31 - 148。

相對於此，產出數本研究農民運動的學位論文，³其中羅文國以官方政策及農民運動的形成為題，屬於傳統政治史的範疇，他以1926年為界，將日治時期臺灣農民運動分成前、後兩個階段，前段屬於小規模、小團體的抗爭，後段則透過臺灣農民組合進行組織性的宣傳與抗爭，無論是爭議層面或參與人數都較前期擴大且增加。羅文國並指出，各地的農民爭議大多有臺灣文化協會成員參加，各農民組織也以文協幹部為主要核心，1926、27年間更是受了替「二林事件」辯護而來臺的日籍律師布施辰治等人之啟發，進而推動農民運動的組織化，似乎認為知識菁英對臺灣農民運動影響頗深。⁴

對此，陳翠蓮之研究抱持不同的看法。陳翠蓮質疑《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認為農民運動興起是受到文協影響的說法，似乎認為農民運動是受到臺灣文化協會的影響，是充滿民族主義政治要求的社會運動，且官方認為農民運動是群眾受到菁英鼓動的結果，和農民本身的利益無直接關係。陳翠蓮以「資源動員理論」（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觀點出發，她透過實際閱讀史料後發現，陳翠蓮先觀察農民運動的興起背景為1920年代的大正民主時期，政治控制相對鬆動，提供農民運動活動的有利空間。其次，陳翠蓮進一步分析1923年至1929年間參與臺灣農民運動的菁英之背景，認為雖然臺灣農民運動中有少數菁英扮演領導的角色，但群眾仍相當具有自主性，農民對合理待遇的訴求與農民運動中菁英份子所追求的社會主義意識型態的實踐並不相同，外來菁英的角色未必有如「資源動員理論」所主張的那麼重要。最後，陳翠蓮認為農民運動後期菁英逐漸介入取得領導地位，但農組的日趨激進反而

3 學位論文部分有潘俊英，〈臺灣農民運動初探（1895 - 2005）〉，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三民主義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2005年。羅文國，〈日本殖民政策與臺灣農民運動的形成（1895 - 1931）〉，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年。廖美，〈臺灣農民運動的興盛與衰落：對二〇年代與八〇年代的觀察〉，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年。楊光華，〈日據時期臺灣農民組合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年，等等。

4 羅文國，〈日本殖民政策與臺灣農民運動的形成（1895 - 1931）〉，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年6月。

造成知識份子與農民間的日漸疏離，加速農組的萎縮。⁵透過史料一層一層地爬疏、剖析，陳翠蓮細緻地分析農民組合、農民運動與知識份子間的關係，提出臺灣農民運動研究的新解釋，對吾人從事臺灣農民運動研究時有莫大啟發。

相對於陳翠蓮強調農民運動中農民自身的自主性，陳慈玉則著重於簡吉及李應章在農民運動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陳慈玉利用簡吉與李應章的日記，以及相關檔案、記載、報刊等資料，論述地方菁英在1920年代臺灣農民運動中的角色，她認為，臺灣農民運動是李應章、簡吉催生的結果，有別於中國傳統社會中常見的抗租、抗糧等租佃制度的不平等，1920年代農民們力爭的是耕作權與較合理的原料交易權，在地方菁英的李應章、簡吉奔走呼籲下，農民們提高對利益分配不平等的意識，進而對於自身權益的爭取表現得更為積極，李、簡等人扮演了領導者的角色，1920年代農民運動能多少獲得勝利，他們是功不可沒的推手。然而他們也因此付出了代價，分別進入牢獄，李應章甚至遠走中國。⁶

此外，陳景峰以曾文農民組合為探討對象，分析其領導者的角色。陳景峰指出，曾文農民組合的領導者可分為「受文協民族運動啟發的返鄉新知識份子」，以及「出身小地主、或從事農業的小資產家」，而曾文農民組合就是靠這些在地知識份子掌握地方經濟資源，並號召勞動階層參加，來維繫其運作。後來農組因簡吉等主導者走向社會主義，在地知識份子與之理念遂生不合而逐漸脫離，再加上農民在協調後現實條件獲得改善而選擇與資方和解，曾文農組遂面臨衰落。⁷

日籍學者駒込武則注意到了農民運動中布施辰治的角色。布施辰治在臺灣農民運動高潮時來臺，滯臺期間參加32次農民組合或文化協會所舉辦的演講，透過演講到處傳播其「無產階級必須團結並獲得解放」的

5 陳翠蓮，〈菁英與群眾：文協、農組與臺灣農民運動之關係（1923 - 1929）〉，陳慈玉主編，《地方菁英與臺灣農民運動》（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8年3月），87 - 124。

6 陳慈玉，〈地方菁英在一九二〇年代臺灣農民運動中的角色〉，陳慈玉主編，《地方菁英與臺灣農民運動》（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8年3月），127 - 159。

7 陳景峰，〈「曾文農民組合」中領導分子的角色探討〉，《臺灣風物》第57卷第1期（2007年3月），頁143 - 164。

主張。駒込武亦從布施辰治的書信中發現，他自覺到身為日本人擁有特權，例如他讓因至基隆港揮舞旗幟歡迎他而被警察拘留的農組及文協成員獲得釋放並取回旗幟等。⁸然而駒込武的文章主要在談布施辰治與簡吉的互動，對於日籍知識份子與臺灣農民運動的著墨較少，甚為可惜。

由上述回顧可知，目前關於臺灣農民運動的研究中，關於參與其中的知識份子主要仍將焦點放在臺籍人士上，較少關注日籍知識份子的參與情形。然而，細看臺灣農民運動，我們發現許多日籍知識份子仍然跨越國族的界線，參與臺灣農民運動的抗爭。除了布施辰治、古屋貞雄、麻生久等律師外，泉風浪是另一種類型。身為記者的泉風浪，不僅支持數個關鍵的農民組合，也參與了多場重要的抗爭，曾參加農民運動的臺人在日後的回憶錄中曾提到泉風浪對農民運動也頗為支持。此外，泉風浪在日治時期撰有多本著作，可供吾人了解臺灣農民運動的重要參考。

本文先論述泉風浪的生平及經歷，了解其人的性格與活動，再透過泉風浪的回憶錄及各種著作，輔以《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等相關史料，嘗試闡明身為一名日籍菁英，泉風浪如何看待1920年代的臺灣農民運動，並且如何在農民運動轉向時隨之趨近與背離；最後進一步嘗試分析他在以臺灣農民為主的農民組合與農民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並從其對農組的方向及農民運動的運作模式等看法分析其思想，藉以了解一位抵抗資方、支持農民運動的在臺日本人泉風浪，對臺灣農民運動的態度與侷限。

二、泉風浪的生平及經歷

泉風浪，1893年生於日本宮崎縣，畢業於日本大學，先後任職於《東洋新聞》、《東京夕刊新報》、《國民新聞》、《東京日日新報》等報社。⁹少年時的志願是成為新聞記者或律師，但因其其在東京無法謀

8 駒込武，〈布施辰治與簡吉〉，《臺灣風物》第56卷3期（2006年9月），頁9－26。

9 豐田英雄，〈人物編〉，《臺灣新聞總覽》（臺北：國勢新聞社臺灣支社，1936年7月），頁1。

到律師工作而斷然放棄成為律師一途，轉而從事新聞記者。成為記者後，泉風浪特別景仰西村天囚、¹⁰鳥居素川、¹¹本多精一¹²等社會上知名記者，西川、鳥居、本多等人不僅是社會上知名的人物，亦常常發表批判官方的言論。

雖然無法成為為民眾發聲的律師，選擇以記者為業的泉風浪仍然抱持著對政治的熱誠。1918年，他以學生議員的身分參與在東京神田青年會館舉辦的全國學生聯合的「大擬國會」，¹³要求以「賦予殖民地人民選舉權與被選舉權」為首的十項法案，¹⁴並主張內閣應以「成立促進人類永遠和平的國際聯盟、整理行政與財政以減輕國民負擔、改革教育制度、圖宗教之發達，以達成堅實的國民精神」為施政綱領。該會在空前的盛況中閉幕，並達成賦予臺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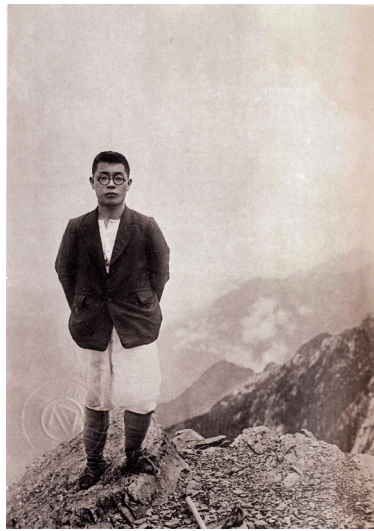


圖1 泉風浪攝於新高山

- 10 西村天囚（1865 - 1924），日本鹿兒島縣人，本名為西村時彥，天囚為其號，又號碩園。日本知名記者，為日本《大阪朝日新聞》主筆，該報「天聲人語」專欄即由天囚命名。天囚擔任記者期間，以甲午戰爭時的日軍隨軍記者知名，其秉持「不偏不黨」之原則撰寫社論，1919年離開報界後進入宮內省御用掛服務。秦郁彥，《日本近現代人物履歷事典》（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2年5月），頁389。
- 11 鳥居素川（1867 - 1928），本名鳥居赫雄，號素卿、玄兔等。先後服務於《日本》、《大阪昭日新聞》等報社，其任《大阪昭日新聞》編集局長時，推動民本主義，對非立憲的寺內正毅內閣批判尤為激烈，1918年白虹筆禍事件發生後辭職。秦郁彥，《日本近現代人物履歷事典》，頁358。
- 12 本多精一（1871 - 1920），日本福井縣人，1899年任職《大阪朝日新聞》，1905年任《東京日日新聞》社長、主筆，1914籌組、發刊《財政經濟時報》，以經濟專長見長。朝日新聞百年史編修委員會編，《朝日新聞社史》明治編、大正、昭和戰前編（東京：朝日新聞社，1995年7月），頁16。臺灣日日新報，〈新刊圖書紹介 財政問題百話〉，《臺灣日日新報》1911年8月16日，3版。
- 13 所謂「擬國會」是指大學生所組成的模擬國會的學生活動，似乎為大正時期東京地區大學生經常舉辦的學生活動，尤以早稻田大學為最。早稻田大學早在改校名為「早稻田大學」之前的1897年起，基於使學生學習「活的政治」（生きた政治），而為該校政治科的學生舉辦「國會演習」，模擬國會討論並審議議案，稱為「擬國會」。至於「大擬國會」，可能是指大學生所舉辦的擬國會活動，惟限於筆者能力，目前尚未能對「大擬國會」有進一步的了解。島善高，《早稻田大学小史》（東京：早稻田大学出版部，2003年2月），頁50 - 52。
- 14 十項法案包括「賦予殖民地人民選舉權與被選舉權」、「實施普通選舉」、「設置國立職業介紹所」、「廢止死刑」、「廢止警察配劍」、「廢止公娼」、「實施物價調節與陪審制度」、「改正學制」、「設立庶民劇場」及「改正治安警察法」。泉風浪，《新聞人生活式十有五年》，頁52 - 55。

朝鮮等殖民地人民選舉權及被選舉權等數十項決議。¹⁵1919年2月，他進一步參與日本普選運動的示威活動。此外，他亦曾因米穀統制問題反對原敬內閣，並支持勞動問題、普通選舉促進運動、陪審制度的實施、考試制度的改正、浪人會征伐等社會運動，也曾參加「日支鮮臺」議題、與堺枯川¹⁶、大杉榮等社會主義者有關等多場演講、立即加入聯合國運動及其他政治、社會運動。¹⁷可見他對政治的熱忱及對社會運動投入之程度。

然而，這樣積極投身打倒原敬內閣、支持勞資爭議解決的泉風浪，此時對臺灣的一切完全不了解，當時因關西地區當時為工業地帶，他時常在關西針對相關議題進行演說，1919年，在一次討論勞動問題的演說會上，泉風浪負責一個名為「蕃人資本家性格相關論」的講題，因對該議題的不了解，最後只能憑著「蕃人是餓他人之首也覺得還好的種族」這樣的一點印象上臺演說，演講中將日本資本家比作蕃人，認為他們獵他人之首亦覺得無所謂。這樣的演說，竟獲得滿堂彩，而他個人在感到不好意思之餘，也認為這是他和臺灣無形中的緣份。¹⁸

我們或可從資助泉風浪從事上述活動



圖2 畫家國島水馬所繪泉風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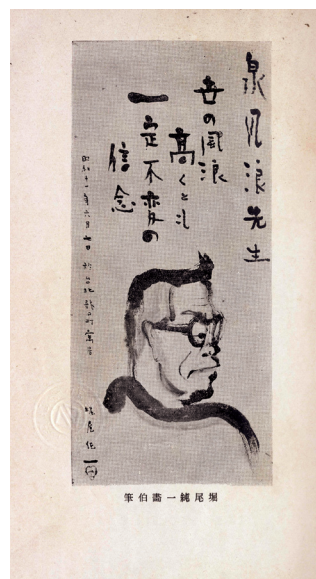


圖3 畫家堀尾純一所繪泉風浪

15 泉風浪所列舉的決議有「賦予臺灣、朝鮮等殖民地人民選舉權與被選舉權」、「即刻實施內地的普選」、「廢止警察配劍」、「廢止全國的公娼」、「即刻實施陪審制度」、「改正治安警察法」、「加入即將成立的促進世界和平之國際聯盟」、「廢止高等文官考試制度」、「廢除全國鐵路寬軌化」、「制定航空郵政法」、「策劃國防之充實」、「改正封閉人才登用之途的現行文官任用令」、「廣泛延攬人才」、「路海軍大臣由文官出任」及「改正武官總督都督官制」等。泉風浪，《新聞人生活式十有五年》，頁52-55。

16 即堺利彥，「枯川」為其號。秦郁彥，《日本近現代人物履歷事典》，頁236。

17 泉風浪，《新聞人生活式十有五年》，頁52-55。

18 泉風浪，《新聞人生活式十有五年》，頁64-65。

的人士判斷其政黨傾向。泉風浪曾言，他曾接受鹿兒島選出的議員藏園三四郎、律師布施辰治、後藤新平、柵瀨軍之佐¹⁹、關和知、高橋光威等人的資金挹注，²⁰其中，藏園三四郎屬於政友本黨，布施辰治則是積極從事社會運動的律師，柵瀨軍之佐同為記者，從政之後為憲政會領袖。關和知於1919年就任憲政會幹事長，只有高橋光威在原敬內閣中擔任書記官長。可見泉風浪雖未言其政黨傾向，從其批判原敬內閣，以及活動資金來源可窺知，泉風浪應與政友本黨及憲政會較為接近。

三、泉風浪的臺灣生涯

關於泉風浪受聘來臺一事，根據他的回憶，當時有位報界前輩來訪，表明受到臺灣的《臺灣新聞》之託，須從東京聘請兩、三位報界傑出人士前往整頓，並奉上兩百圓的旅費及預付一百圓的薪資。這位前輩應是當時報界元老西村文則。西村文則過去曾在《臺灣日日新報》與大野恭平²¹同事，後大野恭平主持《臺灣新聞》時，以改革該社編輯、營業方針等項目為由，從東京聘請泉風浪，以及曾擔任《滿洲日日新報》經理、《國民新聞》等職，並曾擔任日本知名英文報紙《The Japan Times》（ジャパントゥタイムス）經理小島草光。1919年9月16日，泉風浪抵臺，受聘於位於臺中的《臺灣新聞》。

日治時期臺灣報刊發行屬於許可制，1917年總督府頒布「臺灣新聞紙令」，規定報社須向總督府申請並獲得許可後方可發行報紙，因此日治時期臺灣所發行的民間報紙並不多，《臺灣新聞》即是其中之

19 柵瀨軍之佐（1869 - ？），日本岩手縣人，畢業於英吉利法律學校，1889年進入山梨日日新聞社，後轉入東京每日新聞社後，於1900年4月以「大倉組」臺北支店主任身分來臺，1908年當選眾議院議員。岩崎潔治，《臺灣實業家名鑑》（臺北：臺灣雜誌社，1913年），頁108。

20 泉風浪，《新聞人生活式十有五年》，頁100。

21 大野恭平（1888 - ？），號木瓶，日本福島縣人，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科畢業，前後於《東京日日新聞》、《やまと新聞》服務，1910年10月轉入《臺灣日日新報》，1917年3月19日臺中《臺灣新聞》社人事大異動，大野恭平從《臺灣日日新報》轉入《臺灣新聞》擔任主筆。為日治時期在臺知名之日籍記者。新臺灣社，《新臺灣》御大典奉祝號（臺北：新臺灣社，1915年）。

一。1901年4月，臺灣日日新報社將其臺中支部改組為《臺中每日新聞》，1903年3月再改名《中部臺灣日報》，1908年10月復更名為《臺灣新聞》，²²新竹、臺中兩州廳及市役所之公報均附刊於此，²³1917年臺灣新聞社改組後，社長為松岡富雄。²⁴從其創刊過程、人事等各方面來看，《臺灣新聞》與臺灣日日新報系統及官方之關係不可謂不密切，一篇署名為「城東生」之文章即將《臺灣新聞》、《臺灣日日新報》與《臺南新報》並稱為臺灣三大御用報紙，對總督府政策不加批評。²⁵

泉風浪是否在來臺之前就已知曉於《臺灣新聞》與官方的關係已不得而知，然而他在回憶錄中寫到來臺後對於官廳屢屢來電召去記者，要記者配合撰寫所謂「御用記事」感到十分驚訝，並強調自己遇到這樣的要求時一律拒絕。雖然對於泉風浪拒絕按照官方劇本演出的說法今日已難查證，不過1924年他則因社內人事鬥爭轉而加入臺南新報社，雖然臺南新報社本社位於臺南，但任職該社期間，泉風浪仍繼續留在臺中。四年半後，泉風浪因支持臺灣農民運動而再度離職，轉入南瀛新報社服務，²⁶可知其批判總督府政策、支持群眾的立場是越來越鮮明的，1928年2月26日《臺灣民報》上刊登泉風浪和「臺灣人有志」1月已在橫濱創刊日文雜誌《民生新論》的消息，其中有不少關於臺灣的文章，「頗有一讀的價值」，²⁷這剛好是在泉風浪離開臺南新報社之後、進入南瀛新報社之前的這段期間，可見泉風浪雖然來臺最初任職於「御用報紙」

22 K生，〈臺灣新聞紙漫談（上）〉，《臺灣警察時報》177期（臺北：臺灣警察協會，1931年3月），頁7-8。

23 張園東，〈日據時代臺灣報紙小史〉，《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刊》5卷3期（1999年3月），頁55。

24 松岡富雄（1870-？），日本熊本縣人，1903年4月以臨時臺灣糖務局囑託身分來臺，後成立帝國製糖株式會社、松岡拓殖合資會社、松岡興業株式會社等公司，是活躍於臺灣產業界之人士，此外，亦任臺中州協議會員、總督府評議員等職，和官方關係良好。自1917年4月起擔任臺灣新聞社長直至1944年該報被合併為止。臺灣新民報社，《臺灣人士鑑》（臺北：臺灣新民報社，1934年），頁168。

25 城東生，〈余の見たる臺灣の日報新聞〉，《實業之臺灣》17卷11期（臺北：實業之臺灣社，1925年11月），頁31-33。

26 李承機，〈第六章 植民地のジャーナリスト像〉，《台湾近代メディア史研究序説—植民地とメディア—》，日本東京大學總合文化研究科地域文化研究專攻博士論文（2004年5月），頁215。

27 〈「民生新論」雜誌出現〉，《臺灣民報》197號（臺北：臺灣民報社，1928年2月26日），頁5。李承機，〈第六章 植民地のジャーナリスト像〉，《台湾近代メディア史研究序説—植民地とメディア—》，頁215。

《臺灣新聞》，後又轉入另一個「御用報紙」《臺南新報》，但其與批判總督府統治政策的臺灣人卻是越來越合流。

關於泉風浪在臺灣居住多久，根據其子泉新一郎的口述訪談得知，泉風浪因熱愛臺灣而打算埋骨於此，因此1945年戰爭結束後他並沒有選擇返回日本，然而隨著臺灣的治安日漸敗壞，社會上逐漸出現反日運動，泉氏一家只得選擇在1946年4月舉家返回日本。²⁸可見泉風浪長居臺灣達27年之久，歷經日治時期中、後期。

泉風浪在臺期間，其著作共有《臺灣自治行政法大意》²⁹、《臺中州大觀》³⁰、《訴願法註解》³¹、《臺灣文官試驗答案集》³²、《漢譯暴力行為處罰法・治安維持法・治安警察法付釋義》³³、《中部臺灣を語る》³⁴、《人と閩》³⁵、《礎石は輝く》³⁶、《新聞人生活式十有五年》³⁷、《臺灣の民族運動》³⁸、《隨感隨想錄》³⁹、《新聞人雜記》⁴⁰、《俺の新聞生活》⁴¹等。

28 泉新一郎口述，所澤潤紀錄，《外地の進学体験——台北師範付属小から台北高校、台北帝大を経て内地の帝大に編入——》（未刊稿），頁6。

29 泉風浪，《臺灣自治行政法大意》（臺中：池ヶ谷至吉，1921年）。

30 泉風浪，《臺中州大觀》（臺中：自治公論社，1922年）。本書於1983年曾由成文出版社復刻出版。

31 泉風浪，《訴願法註解》（臺中：泉風浪，1922）。

32 泉風浪，《臺灣文官試驗答案集》（臺中：自治公論社，1922 - 1923）。

33 泉風浪，《漢譯暴力行為處罰法・治安維持法・治安警察法付釋義》（臺中：泉政吉，1926年）。

34 泉風浪，《中部臺灣を語る》（臺北：南瀛新報社，1930）。

35 泉風浪，《人と閩》（臺北：南瀛新報社，1932年）。

36 泉風浪，《礎石は輝く》（臺北：南瀛新報社，1934年）。

37 泉風浪，《新聞人生活式十有五年》（臺北：鈴木義敏，1936年）。

38 泉風浪，《臺灣の民族運動》（臺中：臺灣圖書印刷合資會社，1937年）。

39 泉風浪，《隨感隨想錄》（臺北：西川武彦，1939年）。

40 泉風浪，《新聞人雜記》（臺北：臺灣婦人社，1940）。

41 泉風浪，《俺の新聞生活》（臺北：臺灣婦人社，194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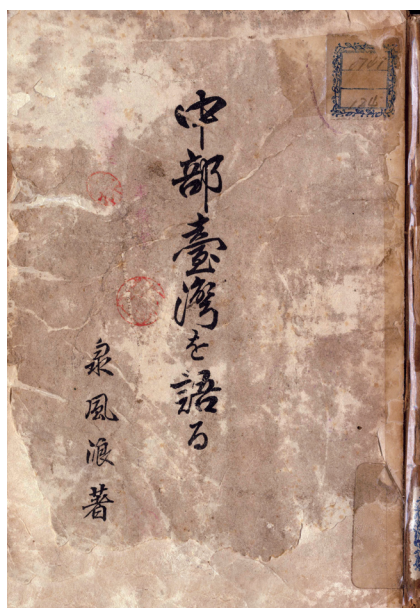


圖4 泉風浪著作《中部臺灣を語る》



圖5 泉風浪著作《礎石は輝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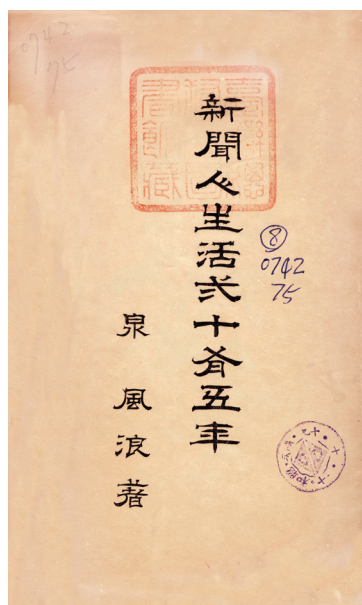


圖6 泉風浪著作《新聞人生活式十年五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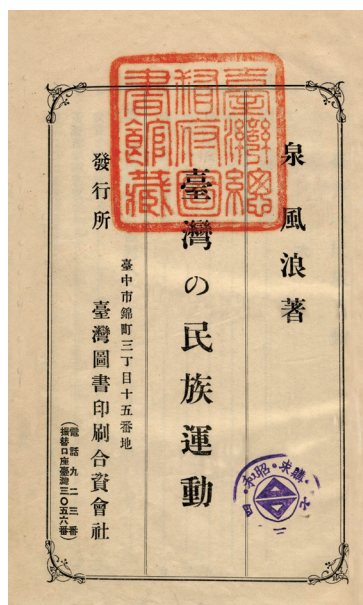


圖7 泉風浪著作《臺灣の民族運動》

四、泉風浪與1920年代臺灣農民運動

日本領臺後，費了近六年的時間，從1898年9月至1903年6月完成土地調查事業，以各地之地理、地形及土地所有情形為調查重心，對地理、地形的測繪提供官方派駐軍警的基礎，而了解土地所有情形，則一方面可確定總督府收取土地財稅收入的對象，另一方面則透過將無主地收歸國有排除了有耕種之實卻無土地所有權的農民。農民在官方收奪土地的过程中始終居於劣勢，再加上官方將這些無主地轉為官有後再次將土地放領（拂下）或無償賣渡（売渡し）給日籍退休官吏、資本家及各種大型株式會社，不滿的農民自然產生反抗情緒，而這也是臺灣農民運動醞釀至興起的背景之一。⁴²

（一）二林事件

根據《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早在1909年，臺灣中部即因林本源製糖會社的土地買收爭議而產生農民群起抗爭，官方認為這是受到日籍律師伊藤的煽動而發生的，當時是伊藤律師離臺、內務局長川村竹治下臺事件方告終。不過，官方明言1920年以來臺灣民眾已開始產生民族的覺醒，再加上臺灣文化協會等思想團體的煽動以及原本的經濟問題，臺灣農民運動開始活潑化，因此，官方認為農民本身「無知蒙昧」，是受到知識份子的指導才使農民抗成結成團體力量，從事農民運動。⁴³

日治時期臺灣蔗作受到原料採取區域制度及甘蔗收購價格由製糖會社決定等限制，農民常常在耕作乃至於收購過程中屈居劣勢。1924年4月，溪州地區農民因甘蔗收購價格低於其他地區之價格，由二林庄長林爐、開業醫許學與蔗農代表和收購主的林本源製糖會社交涉，要求發給臨時補給金。透過北斗郡守的協調，林本源製糖會社同意發給農民

42 淺田喬二，〈第二章 台湾における抗日農民運動の展開過程〉，《日本帝國主義下の民族革命運動—台湾・朝鮮・『満州』における抗日農民運動の展開過程—》（東京：未來社，1973年9月），頁31-54。

43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三）》（臺北：臺灣總督府警務局，1939年7月，1995年6月南天書局復刻），頁995-996。

每甲5圓之補償金，事件遂告解決。而本次交涉的成功帶給臺灣農民運動很大的鼓舞。根據《警察沿革誌》的記載，1925年6月28日，以擔任文化協會理事的醫生李應章為首，結合二林地區蔗農組織「二林蔗農組合」，並以組合名義要求製糖會社爭取提高收購價格。10月21日，製糖會社至組合成員的蔗園採收甘蔗未果，隔日製糖會社原料係長「矢島」偕同巡察部長等7名警察及壯丁再度前往採收，受到百餘名蔗農包圍，農民丟擲甘蔗、小石頭，反抗情緒逐漸高漲，終至巡察部長配劍被奪，警察負傷，農民並揚言要攻擊二林庄製糖會社駐在所。23日臺中州當局會同臺中地方法院檢察官前往二林庄逮捕93名疑似參與前日抗爭事件的農民，並依調查結果依照業務妨害、公務執行妨害、傷害、騷擾等罪名將之起訴，史稱「二林事件」。⁴⁴

然而，同樣的歷史，在泉風浪眼中卻有不同的詮釋。泉風浪表示，二林農組成立後，其受邀擔任該組合顧問，不過泉風浪認為自己雖然是農組的顧問，卻不能只考慮單方面的利益，而是立志在作一個界在兩造之間、能夠公平判斷的角色，責任是在調停雙方的紛爭。二林事件之前，蔗農代表們曾向林糖請願，要求提高收購價格未果，於是他們轉向北斗郡、臺中州、總督府請願，層級逐漸提高，但仍收不到具體的效果，農組幹部們確實開始在二林地區的十幾個村落巡迴演講，但目的在於宣傳農組設立等消息，⁴⁵而李應章則自陳農組幹部巡迴農村演講是向農民報告請願經過，當中也舉辦農民自由演講或座談，交換意見。⁴⁶

泉風浪亦親身參與農民與製糖會社的交涉過程。1925年10月6日那天，李應章等人帶領蔗農前往林糖進行交涉，對林糖提出甘蔗採收前應先公佈收購價格等五項要求，林糖派出吉田專務與兩名職員接洽，泉風浪雖然也在現場，但最初並無表明身分，只是站在在一旁觀看。吉田的態度非常傲慢，完全是上級對下級、老闆對員工的口氣，但是就在泉風浪看不下去，站起來表明身分後，吉田的態度隨即大轉變，針對蔗農的要求提出回應。此外，吉田亦表示交涉的代表須有農組的委任狀。

44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三）》，頁1028 - 1029。

45 泉風浪，《新聞人生活十有五年》，頁192。

46 李玲紅、龔晉珠主編，《臺灣農民運動先驅者：李偉光》（上卷），頁7、32 - 33。

蔗農認為固然雙方無法達成協議，但因泉風浪在場，氣氛還算不錯，以為林糖有交涉的誠意，故雙方約定10月15日備妥委任狀後再談。這次初步協商結束後，泉風浪受到吉田的邀請，但泉風浪以自己與農民同來，應與農民共進退，若是答應邀約則無法取信於農民，失其公平公正的顧問立場為由，拒絕吉田的邀約。當日下午因已無返回二林的車子，由泉風浪出面向林糖商借載運甘蔗的臺車送農民們回二林，而吉田也爽快答應。⁴⁷

然而第二次的交涉卻沒有預期中順利。這次交涉泉風浪沒有出席，林糖的代表吉田態度大轉變，對蔗農們十分不友善，不但表示他只願意和泉風浪協商，不見其他人，更否認農組對蔗農的代表性。⁴⁸這次交涉少了泉風浪的支持，轉向官方尋求解決時又得不到具體的協助，交涉草草結束，也更加激化了農民的不滿。

關於二林事件，官方不斷強調農民是受到李應章的煽動而行事，而李應章與許學等人在領導農民運動上有競爭關係，《警察沿革誌》言，因嫉妒其溪洲交涉之成功，為了取得農民對文化協會的信賴、扶植自己的勢力，李應章自己不僅屢屢拜訪製糖會社該業務負責人，要求提高收購價格，也向臺中州知事、北斗郡守、總督府等提出包含農民須在場參與甘蔗收買價格之決定等多項要求，對於蔗農這方，李應章極力挑起農民對製糖會社與糖業政策之反感，並召來文化協會幹部舉行文化講演會，會上批判製糖業與糖業政策，提高農民的鬥爭性。⁴⁹《警察沿革誌》所言雖然未必公允，但也點出知識份子在農民運動中居於領導者之角色，以及運動陣營中臺籍知識份子內部矛盾。最後，1927年二林事件宣判，法院判決25人有罪，其中8人處以緩刑，⁵⁰可見官方仍然認定二林事件的責任在於農民，而非製糖會社。

然而，泉風浪基於親身參與的經驗，推翻官方的認定，認為是因為製糖會社對於農民的傲慢態度導致二林事件的爆發。泉風浪自言，因為

47 李玲紅、龔晉珠主編，《臺灣農民運動先驅者：李偉光》（上卷），頁68-69。

48 李玲紅、龔晉珠主編，《臺灣農民運動先驅者：李偉光》（上卷），頁69-70。

49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三）》，頁1028。

50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三）》，頁1029。

身為二林蔗農組合的顧問，曾多次代表農組向林本源製糖會社交涉甘蔗收購價格事宜，並勸告製糖會社拿出誠意和農民交涉，但製糖會社態度總是傲慢，輕視農民，終於釀成二林事件。⁵¹除了製糖會社的傲慢外，泉風浪以為這次事件主要的原因在於林糖職員在蔗農與會社達成協議之前就強制收割甘蔗，蔗農們主張「達成協議之前，林糖應暫停收割甘蔗」，但林糖職員仍不顧農民請求而強力收割，農民遂主張在甘蔗尚未被收購前，農民是這些收穫的所有者，任何人不得在未得到承諾下任意收割甘蔗，眼見林糖職員所領來的苦力們著手收割甘蔗，農民只能正面迎擊。⁵²事情遂越發生越大，關係者越來越多。

事件之後，泉風浪也是唯一到現場了解的人，雖然事件過後二林地區到處都有警察環伺，監控人民的舉動，他還是特地借了腳踏車，在當地青年的帶領之下重回現場勘查。當他到二林時，受到蔗農們熱烈的歡迎，根據蔗農的敘述，蔗農們見到他，「猶如在地獄中見到菩薩般的興奮，就像是蔗農們的救星一樣。」⁵³泉的回憶錄中提到這段時，說甚至有農民以救世主誇張的用詞來稱呼他。⁵⁴

（二）從大肚庄退官者拂下土地爭議到臺灣農民組合

臺中州大甲郡大肚庄大肚溪沿岸農地數百甲，長年由臺灣農民耕作。1925年，總督府決定在12月30日將該地由6位退職官吏放領（拂下），農民因恐長年耕作經營血本無歸，1925年9月19日選出4名代表前往拜訪大甲郡守，希望官方能夠取消土地拂下的決定。《警察沿革誌》記載，農民在交涉中接受郡守的說法，1926年開始轉向退職官吏交涉土地補償金額，但是受到趙港的煽動而持續鬥爭，趙港並尋求已於1925年11月成立的鳳山農民組合長簡吉的協助，向總督府陳情，並回到大肚從事組織農民組合的活動。1926年6月6日，以趙港為首組成大肚農民組合（隨後改名「大甲農民組合」），企圖以團體的力量阻擋土

51 泉風浪，《新聞人生活式十有五年》，頁190 - 192。

52 泉風浪，《新聞人生活式十有五年》，頁190 - 192。

53 李玲紅、龔晉珠主編，《臺灣農民運動先驅者：李偉光》（上卷），頁78。

54 泉風浪，《新聞人生活式十有五年》，頁200。

地讓渡移轉。⁵⁵

泉風浪回憶，大肚農民組合結成的時候，剛好是他對臺灣農民運動甚是關心之時，因此，當該農民組合邀請他擔任顧問時，他馬上答應參加。⁵⁶不過當農民運動轉由臺灣農民組合為核心時，泉風浪的態度開始產生變化。

1926年6月簡吉、趙港等人集合各地農民組合代表，提議成立「臺灣農民組合」，由核心人物簡吉領導，本部設於臺南州鳳山街，臺灣各地農民組合轉而成為其支部。同時，在土地拂下爭議的反對運動期間，簡吉等人亦與日本農民組合、勞動農民黨取得聯繫，並受到為二林事件辯護來臺的律師麻生久、布施辰治等人的影響，臺灣農民運動逐漸帶有左翼色彩。⁵⁷1927年2月，臺灣這方土地拂下問題的反對鬥爭正在如火如荼進行的當下，簡吉、趙港等人已前往東京向日本農民組合、勞動農民黨請求協助，因此勞動農民黨決定派遣黨員古屋貞雄律師來臺指導。農民組合也在古屋貞雄在臺期間安排他至各地舉辦演講會，農民運動的方向越來越走上左翼路線。⁵⁸

不過這一切看在泉風浪眼中，已經和其最初的認定大不相同，泉風浪眼見這時的臺灣農民組合所主導的運動已經不僅限於地方上的抗爭，而是具有組織性的活動，在具體做法上，農組也從逼迫地主們在土地所有權上退讓，提升為相當程度的社會運動，特別是在律師古屋貞雄、布施辰治來臺為農組成員辯護的時候，不只是地主們，甚至連總督府都因此感到憂慮，農組的訴求已經從臺灣農民問題擴及民族情感，這樣的農民組合已經脫出泉風浪最初的構想，雖然泉風浪曾經就農組運動的大方向及運作提供個人意見，但他感到農組本質上已經轉變，不再符合他的想法，於是泉與農民組合之間更形疏遠，終至離開。⁵⁹

然而有趣的是，身為日本人的泉風浪看待同為日本人的古屋貞雄的看法。泉風浪說，他離開農組後，農組轉而尋求古屋貞雄擔任農組的顧

55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三）》，頁1035。

56 泉風浪，《新聞人生活式十有五年》，頁180 - 181。

57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三）》，頁1045 - 1050。

58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三）》，頁1050。

59 泉風浪，《新聞人生活式十有五年》，頁185 - 186。

問，不過泉風浪以為古屋恐怕也和他有相同的感受，認為農組成員「到底是沒辦法了解母國人感受的民族」，因而心想「古屋也想和他們（農組）分手吧？」⁶⁰1927年5月古屋貞雄第一次來臺後，短暫返回日本而於同年7月4日再度來臺，並在臺中市開設律師事務所，繼續指導農組與從事與農民爭議相關之民事、刑事辯護，亦積極從事農組陣容擴大、整備及思想的教導，可見泉風浪所以為的古屋貞雄，恐怕和「真實的」古屋貞雄大不相同。

關於農組後來的發展，泉風浪認為因為受到共產主義的拖累，許多成員都坐了牢，出獄以後也不見容於世人，導致終日徘徊遊蕩。要言之，泉在分析農組的發展時，將問題歸結於臺灣人過去未受過團體的訓練，對團體沒有向心力，是考慮自己的利益優於團體的利益的利己主義者，他認為這和優先考慮團體利益的日本人是不相同的。他並舉臺灣人送紅包（前謝金）為例，在臺灣，託付他人以事之前若是沒有先送一點錢，事情是行不通的，泉風浪認為臺灣人就是有這樣的性格，才讓各種農民運動、社會運動終像線香花火一般消失。⁶¹

五、泉風浪在農運中的角色與主張

了解了泉風浪與農民運動的互動後，筆者試圖釐清他對農民運動的參與度如何，和他如何看待農民運動，以及其身為日本人，是否在農民抗爭中在勞資雙方間成為被資方用來分化農民運動的工具。

（一）農民運動之參與度

泉風浪來臺後，因工作關係於臺中定居，從此解開他與臺中的不解之緣，就筆者目前所掌握的資料，尚未能了解泉風浪本人對臺中地區的情感與態度，不過泉對臺中感情應是十分深厚的，他在轉任《臺南新報》時，對報社提出「想留在臺中工作」的要求。時間一久，泉風浪也

60 泉風浪，《新聞人生活式十有五年》，頁186 - 187。

61 泉風浪，《新聞人生活式十有五年》，頁187。

逐漸培養他在臺中民間的人脈。他曾籌資組成臺灣圖書印刷合資會社，根據《臺灣日日新報》的報導，提供資本額讓泉風浪籌組出版公司的大多數是他的臺籍友人，⁶²可見他和臺灣人的互動交遊也是不錯的。1927年3月，吳泗滄之弟吳場獲得醫學博士學位自日返臺時曾假吳子瑜宅開歡迎會，會上多有臺籍知名人物，泉風浪是少數受邀日人。⁶³

然而從泉風浪從事農民運動的足跡看來，他似乎沒有離開臺中、參與他地之農民運動的企圖。從他的回憶中，不難發現他的活動範圍僅限於臺中地區，特別是臺中市，因為其為農組的顧問，因此在當農組有活動時他才會到二林地區參加，就算是日後臺中的農組各地農組合流為臺灣農民組合、重心轉往臺南後，泉風浪也沒有因此加強與臺南的地緣關係。其子泉新一郎談到自己幼年時在臺中生活，但父親泉風浪在臺中和臺北都有工作，⁶⁴可見泉風浪是有機會也有能力參與臺中以外的農民運動的，然而他還是留在臺中，我們從這裡可知他參與的農民運動是帶有地區性的。

至於他對農組發起之活動的參與度，恐怕不如同是日本人的古屋貞雄積極。身為農組顧問的泉風浪，對「顧問」一職的基本態度是不直接親身參與組織的活動，只是在農組有事相問時提供意見，且他也不斷強調自己務求公平公正的立場，並表示農組成員對他的定位也和他有相當程度的共識。同時，泉風浪也不是土地所有權爭議的直接受害者，這些因素多少都使他不像趙港等人一般在農組中扮演帶頭的領導者角色。事實上，泉風浪也坦言即使他提供了自己的意見，農組的走向仍和他所期望的越來越遠，造成他與農組關係逐漸疏離，對農組的影響力與參與度自然也就隨之下降。

此外，筆者以為，泉風浪以一枝健筆，對總督府的抨擊不遺餘力，這些臺灣民間報界的反總督府言論形成一股力量制衡總督府，例如他反對同化政策、反對臺日人通婚，也批評總督府取締報紙言論造成新聞不

62 臺灣日日新報社，《臺灣日日新報》1927年10月11日，4版。

63 臺灣日日新報社，《臺灣日日新報》1927年3月17日，4版。

64 泉新一郎口述，所澤潤紀錄，《外地の進学体験—台北師範付属小から台北高校、台北帝大を経て内地の帝大に編入—》（未刊稿），頁7。

自由等。⁶⁵至於這股力量對農組活動是否造成影響，其影響程度如何，都十分值得另以專文討論。

（二）無知的臺灣人？：「民族」的作用

泉風浪同情臺人的遭遇，也曾說過要是臺灣實施戶籍法，他將把自己的戶籍從日本遷入臺灣，⁶⁶此外，從泉風浪一生的經歷與其自述看來，無論是在日本或臺灣，他對社會問題與工人農民的待遇甚是關心，因此他會投身農民運動，為蔗農爭取權益，並不是令人意外的選擇。二林事件過後，他重返事件現場勘查，戳破官方謊言，可見他並不是一個只有口號而無實踐的記者。

不過這並不代表泉風浪同樣支持殖民地民族運動甚至是臺灣民族脫離日本獨立之主張，相反地，這樣對臺灣友好的日人泉風浪，卻對同化政策抱持著反對的態度。泉風浪認為，「一定要捨棄擁有最高文明、最發達的經濟組織之民族就掌握了在其他民族之上的權利這種舊式觀念」，「沒有一個人種可以擁有將地將其他人種永遠置於劣等地位的權利」，因此他支持美國總統威爾遜的民族自決主張。同時，他也認為隨著被征服的人種對母國政府的參與度越來越高，最後的結局必定是掌握自治權。⁶⁷

但是泉風浪也認為臺灣人和日本人根本上就是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民族性，天生就有無法合而為一的侷限，臺、日兩個民族間的差異不可能在短短三十餘年間就改變，因此，面對臺灣內部為了同化的目的而鼓勵的臺日通婚，他直言自己是不贊成的，他認為通婚的目的是為了同化臺灣人，對日本人並沒有實質的幫助，況且日臺通婚（他稱為「雜婚」）並不會使得臺灣人更像日本人，只會產生既不是日本人也不是臺灣人的一種具有特殊的新性格的民族，一種混血的民族，因此通婚是不合理的。⁶⁸即使是通婚也沒有辦法將臺灣人及日本人合而為一，泉風浪

65 相關言論可參見泉風浪著《隨感隨想錄》。泉風浪，《隨感隨想錄》（臺北：西川武彥，1939年）。

66 泉風浪，《新聞人生活十有五年》，頁211。

67 泉風浪，《臺灣の民族運動》，頁2。

68 泉風浪，《臺灣の民族運動》，頁1-20。

這種對臺日通婚的看法，更可以說明他將臺灣人視為「非我民族」之客體的看法。易言之，泉風浪所支持的毋寧是殖民地自治，而非同化主義。

泉風浪也曾在臺中自治講演會上以「內地自治制度與本島自治制度異處」發表演說。⁶⁹因此，泉風浪同情殖民地人民的待遇、願意提供意見與協助是不爭的事實，甚至為此對抗總督府，不過他基本上還是認為臺灣和沖繩、北海道的人民不同，臺、日人非屬同一民族。

因此，我們已經可以從他的看法理解他與農民運動的關係了。農民運動發展最初目的在於爭取土地所有權的變更與合理的蔗作收購利潤，基於人道立場及其各民族平等的主張，泉風浪不樂見殖民地農民受到欺壓和不平等待遇，因此支持追求平等與殖民地人民之利益的農民運動，前提必須是經由體制內的合法活動進行改革，追求平等。故雖左翼的臺共以「臺灣民族獨立」為口號並逐步掌握農組活動，但是泉風浪所支持的是體制內的行動，當農民運動逐漸左傾，變成激烈的抗爭行動時，他就不再支持此類法律所不許之行為，因此他也責備農民犯了不該犯的錯誤。

他也把臺灣農民運動激烈化的原因歸結為「臺灣人是沒有受過團體訓練的民族」，因此只顧自己眼前的私利，不顧團體的整體利益。如此一來，我們可說他對「臺灣人和日本人畢竟是不同的民族」的看法是相當有意識的。

（三）身為日本人

泉風浪在根本上認為臺、日民族之不同，他也不時意識到他身為日本人的身份，那麼身為日本人，是否在泉風浪與農組間產生影響？

筆者推測，在農組的活動中可能是製糖會社削弱農組團結的對象之一。二林事件之前10月6日的那次協商，製糖會社代表在得知日籍記者泉風浪在場後態度大轉變，並在協商結束後由製糖會社代表吉田邀請泉風浪共宴，泉以無法取信於農民、失其公平公正的顧問立場為由拒絕

69 臺灣日日新報社，《臺灣日日新報》1924年11月4日，夕刊，4版。

邀約，林糖分化泉風浪與農組、引起臺、日人間互相懷疑的企圖十分明顯。此外，在10月15日的二次協商中，吉田一再詢問泉風浪是否在场，他只願和泉風浪協商，並視之為農組的代表人，這可能是林糖拖延及迴避協商的手段，從吉田前次協商中邀請泉風浪共宴的手法看來，或許這是上述企圖又一次的展現。但是在二林事件發生後，不僅臺人家宅被搜索、多人遭到逮捕，就連身為日人的泉風浪也在官方搜索之列，⁷⁰可見表面上泉風浪因其為日人受到禮遇，官方並未因此相信他，反而是相當程度地提防著他。

泉風浪可能是不會說臺灣話的。⁷¹語言上無法直接溝通是否成為他參與的阻礙可能需要更細緻的推敲，但就筆者初步的理解，語言造成的影響可能有限。舉例來說，同樣身為不能使用臺灣話的日人古屋貞雄，來臺的時間甚至晚泉風浪數年，但在臺人的回憶中，雖然也感謝泉風浪對農民運動的支持，但更常被回憶起的是實際為農組人物辯護的律師古屋貞雄，可見語言不是最主要的問題，關鍵應該是在個人參與的事件、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和投入的程度。

六、結論

泉風浪是一名具有政治熱情的記者，居臺二十餘年，主要活動地區在臺中市，關懷工農遭遇，投身臺灣農民運動。他曾任農民組合顧問，他的回憶錄紀錄了二林農組與大肚農組的結成與活動，他也是在二林事件後回到現場勘查後，戳破官方謊言，為農民爭取權益的唯一一人。

泉風浪支持臺灣人爭取權益的農民運動，但身為顧問的他力求公平公正，權衡兩造，要求農民不應採取體制外的暴力抗爭，也批判製糖會

70 泉風浪，《新聞人生活式十有五年》，頁193 - 197。

71 筆者現無直接證據證明泉風浪的語言能力，但其子泉新一郎表示自己完全不會講臺灣話，其次，泉風浪演講時日籍警察能夠以日文速記他演講的內容，若泉風浪是使用臺灣話演說，則日警恐無法來得及完整紀錄；再加上日治時期除了警察因業務需要，總督府鼓勵其學習臺灣話外，其他在臺日人可能無學習臺灣話的風氣與習慣，故初步推測泉風浪可能不會臺灣話。

社或官方的罔顧農民權益。泉風浪對顧問一職的認識，以及他對於農組抱持的態度，都使他雖然身為同情農民、支持農組的在臺日人，卻使他在農民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與參與度，整體而言偏向保守。

此外，他對臺灣農民運動也不是無條件支持。泉風浪認為臺、日人為不同的民族，天生即有同化的障礙，即使臺灣受日本統治三十餘年，終究無法成為同一民族，事實上他也反對有同化的必要。在這樣的體認上，泉風浪反對農民運動從爭取農民權益的社會運動轉變為帶有左翼色彩的體制外鬥爭，因此當農組逐漸走上反體制路線時，泉風浪便逐漸脫離與農組的關係了。

最後，身為日本人，泉風浪在農民運動中亦成為林糖拉攏的對象，林糖可能想藉由拉攏泉達到削弱農組力量的目的，只是當時泉風浪與農民同進退的態度十分堅決，林糖的企圖並沒有成功。不過官方並沒有因為他是日本人而對他寬容，態度依然提防。



圖8 官方對泉風浪的監視紀錄及泉風浪側影

本文使用圖片為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藏，在此一併致謝。

參考書目

- K生，〈臺灣新聞紙漫談（上）〉，《臺灣警察時報》177期（臺北：臺灣警察協會，1931年3月），頁7 - 9。
- 岩崎潔治，《臺灣實業家名鑑》（臺北：臺灣雜誌社，1913年）。
- 駒込武，〈布施辰治與簡吉〉，《臺灣風物》第56卷3期（2006年9月），頁9 - 26。
- 洪長源、魏金絨，《二林蔗農事件：殖民地的怒吼》（彰化：彰化縣政府文化局，2001年11月）。
- 城東生，〈余の見たる臺灣の日刊新聞〉，《實業之臺灣》17卷11期（臺北：實業之臺灣社，1925年11月），頁31 - 33。
- 新臺灣社，《新臺灣》御大典奉祝號（臺北：新臺灣社，1915年）。
- 秦郁彥，《日本近現代人物履歷事典》（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
- 泉新一郎口述，所澤潤紀錄，〈外地の進学体験—台北師範付属小から台北高校、台北帝大を経て内地の帝大に編入—〉（未刊稿）。
- 泉風浪，《俺の新聞生活》（臺北：臺灣婦人社，1940年）。
- 泉風浪，《新聞人生活貳十有五年》（臺北：南瀛新報社，1936年10月）。
- 泉風浪，《新聞人雜記》（臺北：臺灣婦人社，1940）。
- 泉風浪，《人と閥》（臺北：南瀛新報社，1932年）。
- 泉風浪，《礎石は輝く》（臺北：南瀛新報社，1934年）。
- 泉風浪，《中部臺灣を語る》（臺北：南瀛新報社，1930）。
- 泉風浪，《臺灣の民族運動》（臺中：泉政吉，1928年12月）。
- 泉風浪，《隨感隨想錄》（臺北：西川武彥，1939年）。
- 張圍東，〈日據時代臺灣報紙小史〉，《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刊》5卷3期（1999年3月），頁49 - 58。
- 陳景峰，〈「曾文農民組合」中領導分子的角色探討〉，《臺灣風物》第57卷第1期（2007年3月），頁143 - 164。

- 陳慈玉，〈地方菁英在一九二〇年代臺灣農民運動中的角色〉，陳慈玉主編，《地方菁英與臺灣農民運動》（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8年3月），127 - 159。
- 陳翠蓮，〈菁英與群眾：文協、農組與臺灣農民運動之關係（1923 - 1929）〉，陳慈玉主編，《地方菁英與臺灣農民運動》（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8年3月），87 - 124。
- 楊光華，〈日據時期臺灣農民組合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年。
- 羅文國，〈日本殖民政策與臺灣農民運動的形成（1895 - 1931）〉，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年6月。
- 李承機，《台湾近代メディア史研究序説—植民地とメディア—》，日本東京大學總合文化研究科地域文化研究專攻博士論文，2004年5月。
- 李玲紅、龔晉珠主編，《臺灣農民運動先驅者：李偉光》（上卷）（臺北：海峽學術，2007年4月）。
- 廖美，〈臺灣農民運動的興盛與衰落：對二〇年代與八〇年代的觀察〉，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年。
- 淺田喬二，《日本帝國主義下の民族革命運動—台湾・朝鮮・『満州』における抗日農民運動の展開過程—》（東京：未來社，1973年9月）。
- 潘俊英，〈臺灣農民運動初探（1895 - 2005）〉，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三民主義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2005年。
- 臺灣新民報社，《臺灣人士鑑》（臺北：臺灣新民報社，1934年）。
- 臺灣民報社，《臺灣民報》197號（臺北：臺灣民報社，1928年2月26日）。
-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三）》（臺北：臺灣總督府警務局，1939年7月，1995年6月南天書局復刻）。
- 豐田英雄，《臺灣新聞總覽》（臺北：國勢新聞社臺灣支社，1936年7月）。

島善高，《早稻田大学小史》（東京：早稻田大学出版部，2003年2月）。

朝日新聞百年史編修委員会編，《朝日新聞社史》明治編、大正・昭和戦前編（東京：朝日新聞社，1995年7月）。

Izumi Furo and the Peasant Movement in 1920s:
A Discussion from the Books Written by Izumi Furo

Tsai, Hui-Pin

Abstract

Peasant movement in Taiwan were proceeded in 1920s. Most of discussions are about the Taiwaness elites not Japaness, but they are still important. Izumi Furo is one example of them. He was a reporter in Taiwan, and until 1930s, he had concerned about the peasant movement in Taiwan and supported them. This discussion try to understand the experience of Izumi Furo from the books written by Izumi Furo first. And try to explain a Japaness elite, Izumi Furo was how to join the peasant movement in Taiwan secondly. We also want to know being a Japaness elite, Izumi Furo's attitude and limit finally.

Keywords: Izumi Furo, Peasant movement in Taiwan, Japanese in Taiwan, reporter

泉風浪與1920年代臺灣農民運動：以泉風浪著作為中心

臺灣文獻

第六十一卷第三期